

「視野、人物及網絡：印中聯繫，1900-1960」工作坊紀要

徐啟軒 哥倫比亞大學東亞語言及文化系博士生

近年中國和印度經濟發展迅速，在國際上發揮日益重要的角色之餘，兩國之間就邊界糾紛和西藏問題的矛盾更是影響亞太地區未來發展的重要變數。長期以來，鑒於學術分工，中印關係多是政治學的範疇，較少歷史學者就這兩個國族國家在二十世紀興起過程中的合作、紛爭和互動作梳理。為了填補遺缺，新加坡國立大學亞洲研究所（Asia Research Institute）協同新加坡東南亞研究院那爛陀－室利佛逝研究中心（Nalanda-Sriwijaya Cent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主辦了「視野、人物及網絡：印中聯繫，1900 -1960」（Visions, Individuals and Networks: India-China Connections, 1900-1960）工作坊。會議於2012年7月23至24日假東南亞研究院研討室舉行，在二天六場次中，共有13位來自新加坡、印度、中國大陸和美國不同院校的學者參與，發表12篇研究報告並進行綜合討論。筆者有幸獲邀參加會議，現簡略報導會中情況如下：

第一天（7月23日）早上10時會議開幕，由新加坡國立大學亞洲研究所所長杜贊奇（Prasenjit Duara）教授和那爛陀－室利佛逝研究中心主任沈丹森（Tansen Sen）副教授致歡迎辭及介紹工作坊議程。沈教授指出傳統上歷史學者集中研究兩國古代宗教文化交流史，尤其是佛教由印度傳入中國的過程。相對而言，20世紀上半葉的中印關係卻仍然是學術研究的一大空白。工作坊

的目的正是探討中國和印度的社會菁英和從屬（subaltern）階層如何在國族國家興起和去殖民化的大潮下，思考不再由歐美主導的新世界秩序，想像中、印兩國合作的可能性。工作坊以 19、20 世紀之交為始，1962 年中印邊境戰爭為訖；正如杜教授所言，其中堅持兩國合作的人物，大部分是違背官方立場而行的民間人士。

繼歡迎辭後，接著進行三場報告，每場次由兩位學者發表論文。首先是北京大學朱麗雙（Zhu Lishuang）博士的“Lu Xingqi: The Agent of Republican China in Calcutta on Tibetan Affairs in the Early 1910s”，利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和圖書館所藏的民初文獻，探討民國政府護理駐藏辦事長官陸興祺在印度的活動。陸興祺是清朝末年在加爾各答從事進出口貿易的廣東商人，由於熟識印度時局以及英國政府對藏政策，先後得清廷和民初北京政府重用。1913 年，陸興祺被民國政府委任為護理駐藏辦事長官，接替被第十三世達賴喇嘛趕出西藏的清末將領鐘穎，試圖修復北京和拉薩之間頻臨破裂的關係，在西姆拉會議（Simla Conference）前後為中國政府提供情報。但護理駐藏辦事長官頭銜未獲英、藏兩方承認，陸興祺亦從來只能在加爾各答處理公務，在英印政府的嚴密監視下吃力工作。德里大學瑪姐玉（Madhavi Thampi）副教授的“Raja Mahendra Pratap: An Indian Visionary in Republican China”，分析印度民族解放

運動先驅拉賈·馬亨德拉·普拉塔普（Raja Mahendra Pratap）在 1920 至 1930 年代多次訪問中國，宣揚泛亞洲主義，獲宋慶齡、馮玉祥、吳佩孚、以及顧維鈞、孫科、胡漢民、陳立夫、汪精衛等國民政府要員接見招待。九一八事變發生之後，泛亞洲主義有為日本佔領東北三省正當化之嫌，令普拉塔普成為中國知識分子鄙視的人物，最後甚至被驅逐出境。

第二場發表會由華盛頓大學楊雅南（Anand Yang）教授和貝勒拉斯印度教大學嘉瑪希（Kamal Sheel）教授宣讀兩篇內容相關的論文，題目分別為“China and India are One: A Subaltern’s Vision of ‘Hindu China’ During the Boxer Expedition of 1900-1901”和“China in Subaltern Indian Images: Travel Narratives of Thakur Gadadhar Singh and Mahendu Lal Garg During the Boxer Rebellion”。論文根據兩部 1901 年出版的印地語軍旅日記為主軸，論述兩名跟隨英軍攻入北京、剿平義和團的印度籍軍官和軍醫的中國觀。兩位學者指出，撒庫爾·伽達塔爾·辛格（Thakur Gadadhar Singh）和馬亨杜·拉爾·伽格（Mahendu Lal Garg）作為英國殖民統治之下印度從屬階層的代表，他們對中國的態度與當時的歐美以致日本殖民者截然不同。他們對跟印度一樣遭受外國侵略浩劫的鄰國寄予同情、批評八國聯軍在中國殘暴的掠奪行為、寄望印、中兩國和亞洲未來的復興。

第三場發表會的兩篇論文，首先是筆者的“Huaqiao Activism and China-India Interactions: The Case of Tan Yunshan”，以民國時期歷任政府鼓勵華僑參與國政為歷史背景，論述漢學家譚雲山在旅居馬來亞、印度期間的經歷，例如推廣國語和超越宗族地緣的華僑國族身分認同。其後譚雲山更因地利之便，在抗日戰爭中，促進國民政府和印度國民大會黨合作，以民間人士身份貢獻中華民國的外交事業。第二篇是亞利桑那州立大學麥金農（Stephen R. MacKinnon）教授的“Missed Opportunities: India, China, and Chen Hansheng (1897-2004)”，分析於1925年加入共產國際的留美社會學家陳漢笙對印度的關懷。陳漢笙在民國時期曾任北京大學教授和中研院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於1944至1946年間為了逃避國民黨CC系特務的追殺，寄居新德里，期間除了寫作外，更與印度學者和獨立運動領袖聯繫。中共建政後，陳漢笙返回中國大陸，任外交部顧問，領導外交部南亞組的研究工作，推動中印友好關係。1957年反右運動開始，陳漢笙被投閒置散。眼見1950年代後期中印關係破裂，陳漢笙痛心不已，只好離開官場，寄情學術研究。

第二天首先由尼赫魯大學莫普德（Priyadar Mukherji）教授發表“Netaji Subhas Chandra Bose’s Perspective of China”一文，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倚仗日本，組織自由印度臨時政府（Azad Hind）的國大

黨激進派領袖蘇巴斯·錢德拉·鮑斯（Subhas Chandra Bose）的中國觀。報告指出，鮑斯長年關注中國國民革命進程，認為孫中山推翻帝制後並沒有進一步建立新的社會秩序，雖然成功完成了政治革命，卻忽略推動社會革命，令袁世凱為首的反動勢力有機可乘。鮑斯雖然受日本鼓動，於1943年成立印度國民軍，以求盡快推翻英國殖民統治，但卻敢於批評日軍在中國所作的惡行，對中國民族主義運動始終寄予同情。接著同是在尼赫魯大學任教的狄伯杰（B. R. Deepak）教授發表“Zhou Enlai’s Diplomacy and Vision of India-China Relations”，提出周恩來直至1961年6月還是深信兩國因著相似的被殖民歷史，必能避免為邊界問題大動干戈。但周恩來的溫和政策並未得到印方的積極回應，使得邊界戰爭爆發後，極端的毛澤東路線成為中共外交政策的主調。

工作坊第五場發表會先由哥倫比亞大學博士研究生高龍（Arunabh Ghosh）發表“‘Seeking Common Ground While Accepting Differences’: Making Sense of Sino-Indian Statistical Exchanges, 1951-1959”，從1950年代中、印兩國統計學專家的交流，指出冷戰時期第三世界國家除了從美國和蘇聯兩大強權引進技術外，亦有互相學習、分享科學知識的經歷。接著美利堅大學阿米塔夫·阿查亞（Amitav Acharya）的“The Bandung Conference and the Origins of Sino-Indian Misperceptions: Lessons for Asia’s ‘Engaging

China' Approach”，認為中共總理周恩來 1955 年在萬隆的溫和表現，撫平了亞洲各國對印度總理尼赫魯極力拉攏中共參與第一次亞非會議的疑慮。會議雖然暫時緩和美國為圍堵共產陣營而設的東南亞條約組織在區內引起的緊張氣氛，但中共與印度本身的矛盾卻在各國領袖會談過程中逐漸浮現，為 1950 年代後期始雙方的衝突埋下伏筆。

最後一場論文發表會由紐約市立大學史泰登島分校的夏明 (Xia Ming) 教授宣讀 “The 14th Dalai Lama's Leadership, Transformation of Regimes, and their Impact on India-China Relationship” 一文，論述第十四世達賴喇嘛自 1959 年從西藏流亡印度後，觀察印度議會民主制的成功實踐，並吸收西方思想，逐漸增加位於印度達蘭薩拉的藏人行政中央（或稱西藏流亡政府）的民主元素，至 2011 年把政治權力下放給民選的內閣總理，啟發了一些中國大陸人士對民主的盼望。那爛陀－室利佛逝研究中心主任沈丹森的 “Caught in the Crossfire: Chang Xiufeng and the Deterioration of India-China Relations”，以旅居西孟加拉邦小鎮噶倫堡 (Kalimpong) 的中國畫家常秀峰為例，探討中印關係的起伏如何波及印度華僑。常秀

峰在 1947 年到印度留學，在譚雲山任教的印度國際大學鑽研藝術，學成後與妻子移居噶倫堡，出任當地中華學校校長。噶倫堡鄰近西藏，是各國間諜收集情報的熱點。1959 年以後，中共與印度因西藏和邊界問題交惡，中華學校被懷疑為中共間諜基地，常秀峰則被指是中共特務，最後因危害國家安全之名被印度政府收監，至 1961 年 5 月遣返中國。

所有報告完成後，由杜贊奇教授主持綜合討論，提出了若干應多加思考的問題，計有民間社會的國際文化交流為何往往與國族國家間的政治瓜葛背道而馳？如何在理論層次上詮釋、爬梳、總結中印互動的各個片段？除了雙邊關係外，其他地區如日本、東南亞又在中、印以致亞洲各族群互動的過程中扮演甚麼角色？杜教授指出，近代亞洲各國統治菁英間的關係受制於資本主義體系的利益邏輯，其運作模式自然跟從屬階層的互動迥然，歷史學家宜把兩者分別梳理研究，不應忽視未有國家或主要政黨支持的人物和網絡。與會學者認同會議論文充分顯示中、印兩國除本身的雙面關係外，亦是亞洲區域內人員、思潮、資本流動的載體。會議議程於 7 月 24 日下午 4 時圓滿結束。